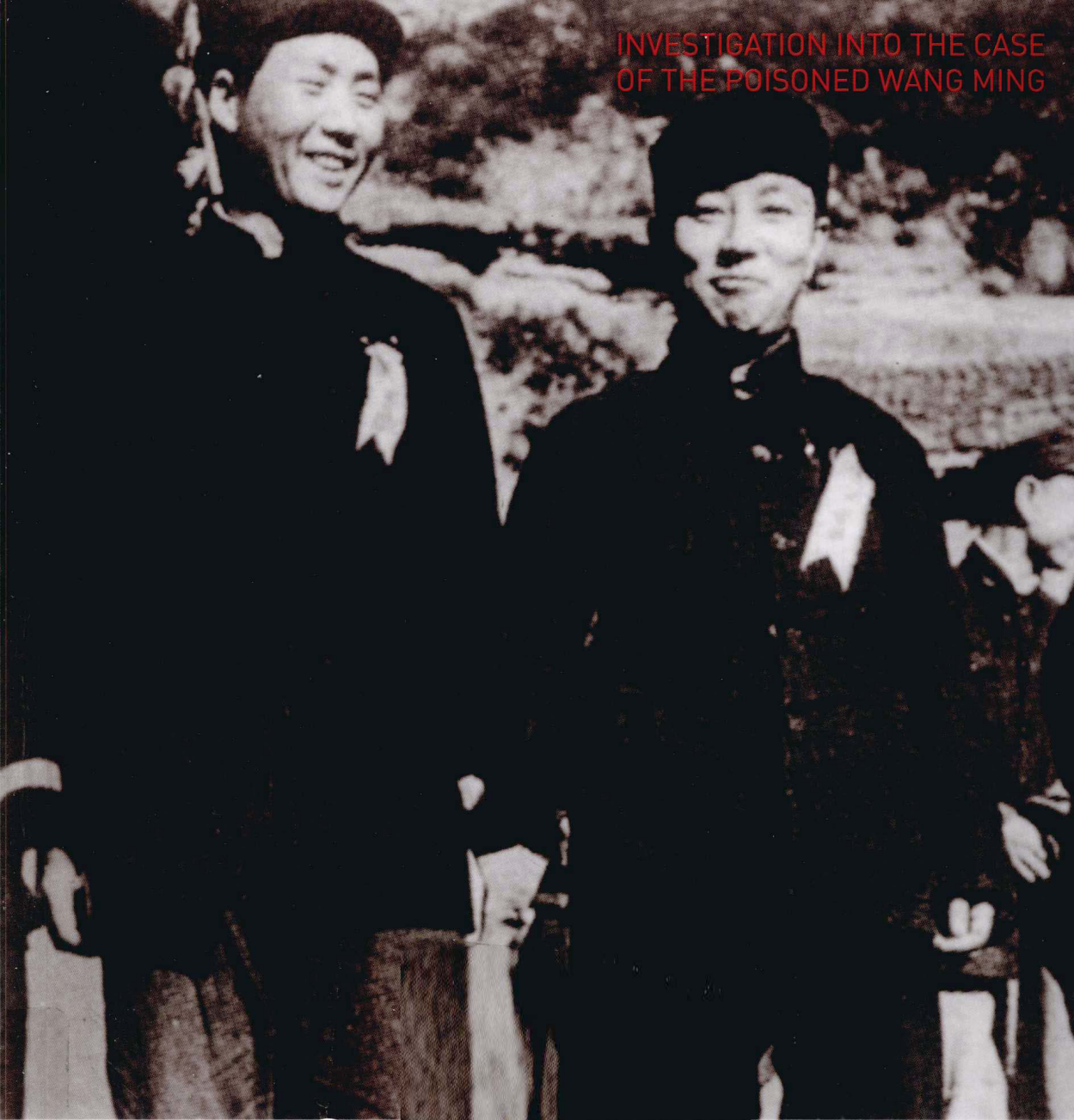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OF THE POISONED WANG MING



丁晓平◎著

从中共理论权威到遗恨莫斯科
王明为什么斗争不过毛泽东？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丁晓平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53-0401-4

I. ① 王… II. ① 丁… III. ① 王明(1904~1974)—人物研究②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① K827=6②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56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04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导语：现在可以说了	3
上篇 “左”·右·“左”	6
——王明中毒事件背景考察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9
十二月会议	40
三月会议	50
六届六中全会	64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80
九月会议（1941）	108
延安整风	140
中篇 人有病，天知否？	168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报告	
王明病了	176
王明中毒了吗？	194
大会诊	232
谣言始于 1943	255
大审查	265
王明在中央医院的日子	278
下篇 大江东去，浪淘尽	288
——王明中毒事件后续影响	
九月会议（1943）	291
历史决议	214
朱豪医院“中毒事件”	333
沉沦不归路	351
结语：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	370
附录：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原始历史证据	373

丁晓平◎著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OF THE POISONED WANG MING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现在可以说了

(导语)

事发于 1943 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一起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王明在其遗著《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又译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骇人听闻地诬蔑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和主管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自 1975 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至今仍堂而皇之地被境外出版物不断地复制、贩卖和炒作为所谓的政治阴谋，影响极其恶劣，成为敌视中国以及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诋毁诬蔑毛泽东的新闻噱头，愚弄和欺骗了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人们。

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共党内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王明大权旁落，遂以生病住院为挡箭牌，在整风运动中拒不承认错误，并以在中央医院住院

期间因医护人员疏忽导致甘汞服药时间过长而发生的医疗事件，借机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难，对抗毛泽东，炮制的一起莫须有的“蓄意下毒”的政治事件，震惊了中共中央。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组成调查委员会，三个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的两位——刘少奇和任弼时都亲自参与调查和审查。同时，中央还组织延安所有医疗专家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大型会诊，中央社会部也介入调查，并对金茂岳进行了关押和审讯。然而，作为一起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因为王明拿走了当年在中央医院的全部病历（包括护士的护病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的记录），另外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导致几十年来缺失足够的原始历史证据和第一手文献来批驳王明的荒谬言论，使他的“谎言”成为“一言堂”，有了市场，以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至今仍如一团迷雾，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件“谜案”。

关于“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现在终于可以说了——本次“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以新发现的 20 件流落民间、尘封近 70 年的原始档案和文献作为物证，以健在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口述史料作为证人证言，完整、权威、详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本次调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针对王明《中共五十年》中所有关于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的歪曲和诬蔑之词，逐一进行质证和辨析，回到历史的现场，洞穿历史的迷津，抵达历史的本质，还原历史的真相！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了调查，也不一定有发言权。关键是调查的结果是否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一言以蔽之，调查必须是真实的。

“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王明“中毒”真的是毛泽东“蓄意

陷害”吗？“王明中毒事件”给王明带来了什么，又给历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穿越历史的调查，是一次回到历史现场的调查。在这样的调查中，我们不要冒充事后诸葛亮，也不要当“马后炮”。还是那一句老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因为历史的尘埃，终究掩不住阳光……

那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尘封的历史，看一看“王明中毒事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到底是怎样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

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

让我们一起慢慢地阅读吧——



上篇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十二月会议

三月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九月会议（1941）

延安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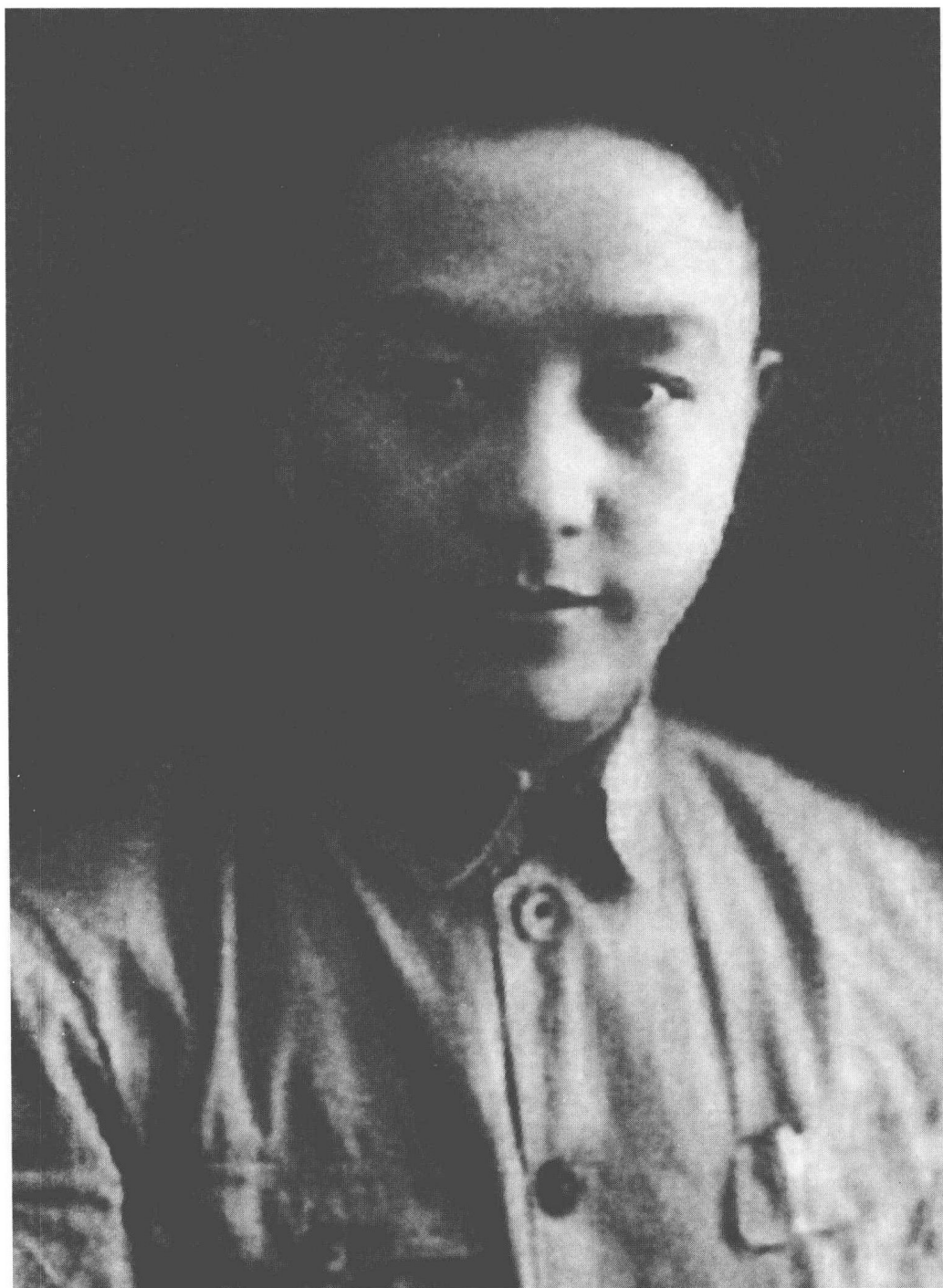
“左”·右·“左”

——王明中毒事件背景考察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说：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左”转到右，则说明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王明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1937年11月29日。红都延安，雪后天晴；黄土高原，银装素裹。

这天下午，两点左右，一只“铁鸟”飞进了延安的天空，巨大的轰鸣声震撼着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这架苏联空军运输机的光临，对延安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稀罕事，爱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者放下手中的活计，闻风而动潮水般赶往东关的机场（延安的这个老机场如今已经改为通衢大道了），都想亲眼看一看这只“铁鸟”是怎样飞上天和落下地的。尽管一年前的1936年4月和12月，张学良的专机曾经来过这里，周恩来也在这里乘坐飞机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但在那个年代，罕见的飞机依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和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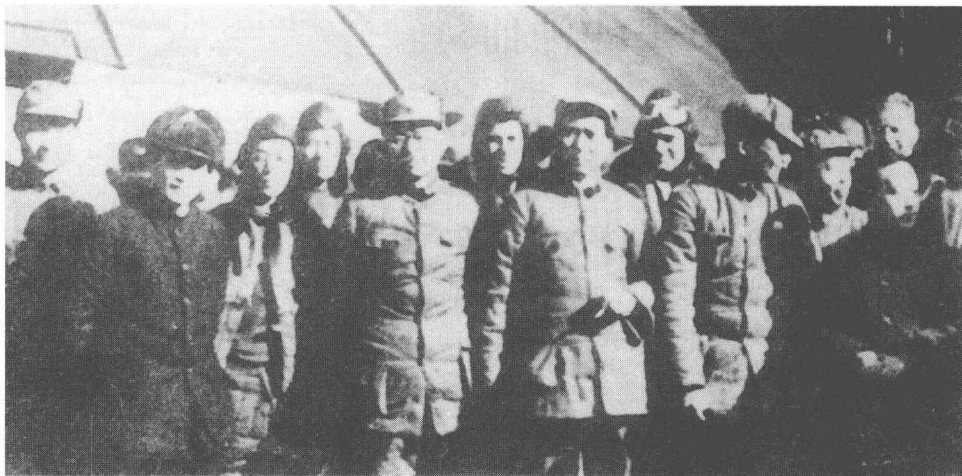
延安城的这个时刻，的确是万人空巷。更令人们兴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国焘等，还有中央机关、边区政府以及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代表及各界群众，纷纷冒着寒冷来到这简易得不能再简陋的机场。

这天，的确寒气袭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都穿着棉袄、戴着棉帽。飞机在准备降落时因群众一拥而上，又不得不拉杆上升，在天空中盘旋了两圈后，才安全地降落。显然，延安今天迎接的肯定是一个重要而又神秘的人物。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王明。

王明本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1904出生于安徽省六安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家庭出身贫民（亦说小商人）。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县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沈子修、桂月峰、朱蕴山、钱杏邨（阿英）等进步师长的思想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王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9月与詹禹生等人发起成立“豫皖青年学会”，任事务部主任；寒假



王明(右一)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右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前排左起:萧劲光、陈云、康生、林伯渠、毛泽东、博古、王明



米夫

[1] 米夫(1901-1938),苏联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24岁的他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等。米夫长期研究中国问题,1931年1月来到上海,支持王明等人召开中共四中全会,操纵选举,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1936年回苏联后任东方大学校长、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等。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米夫负责行政事务。他在会前不断散布对中共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言论。他还指使人放出流言,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牺牲,准备开追悼会,造成恶劣影响。1938年,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秘密枪决,时年36岁。1976年平反。

在家乡金寨联络进步青年成立“豫皖青年学会”。1925年6月,积极参加武汉三镇青年学生掀起的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运动,被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是年10月,王明加入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0月28日,他同俞秀松、伍修权等60余人,作为第一期国内第二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学生,由上海启程,于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在语言能力上的天赋,进入俄文班学习,并很快取得了该校副校长米夫^[1]的信任。王明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克劳白夫”,即“鸟”的意思。显然,他想在这里实现自己革命的理想,展翅高飞。凭着雄辩的口才和流利的俄语,王明很快成为中山大学的知名人物,并于1926年9月“学生公社”改选时一跃成为公社主席。24岁的米夫是当时中山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权威,对中国问题十分关注。1927年1月,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随同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回国,并陪同米夫到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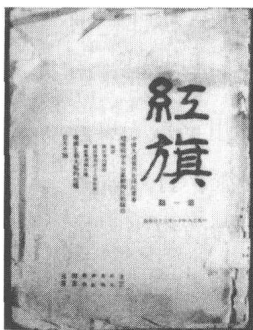
上海、武汉等地。在5月至6月间，他还短暂地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6月16日，他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参加了米夫和陈独秀的谈话。7月中旬，随米夫返回苏联。9月，王明毕业留校做翻译工作。因为利用学校“教务派”与“党务派”的纷争，王明提出“联合党务派、争取中间派、打垮教务派”的建议，协助米夫顺利晋升中山大学校长掌握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进一步得到米夫的赏识，实质上成为其专职秘书。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一下子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炙手可热，并开始形成以王明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王明于1928年带头展开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的活动，这就是后来整风运动时期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2]

1928年，王明还一度担任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的秘书。6月中旬，他在斯大林与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担任翻译。在6月18日至7月11日，他以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还为中共六大代表专门作了所谓《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大出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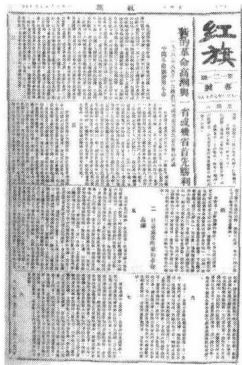
1929年3月，王明回国，先后任上海沪西、沪东区委宣传干事。这个基层的下级职务，令他内心极其不平衡。机敏过人的他就通过中山大学同学、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文郁（又名潘东周）的帮助，调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编辑部。从此，王明如鱼得水，先后用韶玉、慕石、兆玉等笔名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9月1日，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陈独秀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不同意中央提出的“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王明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发表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全盘否定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某些正确主张，成为批陈的马前卒。11月27日，他在《红旗》第57期发表《论陈独秀》，一下子成为中共党内全面否定陈独秀的先锋。

1930年1月，王明被捕后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暴露了中央秘密机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撤销他在中宣部和《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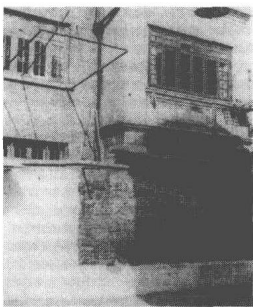
[2] 郭德宏：《王明的这一生》，《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



《红旗》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文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

编辑部的工作，调到全总党团任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因为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7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第二天，因为公开反对“立三路线”，王明再次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则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两次处分令王明耿耿于怀。9月24日，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在莫斯科的俄化教育和政治经历，使他清楚地明白中国革命只有服从并服务于苏联利益，才能得到莫斯科斯大林的支持和帮助。他随即开始反攻，并于11月17日联名博古致信中央，标榜自己一贯反对“立三路线”，要求中央肯定他的“政治意见是绝对正确”，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同时，他发挥自己“笔杆子”的强势，在半个月突击完成了6万言的《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后来改名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与纲领。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命纠正“立三路线”来华，首先会见了王明。随后在米夫一手操纵之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而王明也因祸得福，转而抓住机会狠批并打击瞿秋白、何孟雄、罗章龙等人。25日，王明出任改组后的中共临时江南省委书记。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坐镇上海，对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进行大换血，结果没有在党内真正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甚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不仅当选中央委员，而且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决定任候补常委，开始掌控中央大权。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候补委员。此后，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王明游刃有余地成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大红人”，正式走上历史的前台。倚靠米夫，王明挥舞共产国际大棒，对党内不同意见者进行穷追猛打。在牢固稳住上海、江苏的领导地位后，王明通过设立中央局，并派后来被毛泽东称作所谓“洋房子先生”的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钦差大人满天飞”，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26岁的王明执掌中共中央最高权力。但在当时白色恐怖形势下，王明深感上海危机四伏，过着心惊肉跳的日子，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为了推行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他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从此，博古这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年仅24岁的少共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0月18日，王明选好在国内的代理人后，自己堂而皇之地偕妻子孟庆树秘密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再次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安全日子。

出马一条枪，出名靠文章。既不是建党元勋，又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对军事指挥更是一窍不通的王明，凭着自己留学苏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背景支持，一下子成为中共党内马列主义的理论权威和实际大权的掌控者。一介书生靠“笔杆子”的发迹史不可谓不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在国内，王明以国际路线代表和理论权威自居，用苏联的东西吓唬中国人；在国外，他混淆是非，用中国的东西忽悠外国人。不久，两面讨巧、见风使舵的王明，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他的“大救星”米夫，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秘书处候补委员，负责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党的事务。季米特洛夫^[3]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需要关注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明一起当选为

[3]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印刷工人出身，在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为打击共产党制造的所谓“国会纵火案”中遭到诬陷并逮捕受审，但他在法庭上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富煽动性的演讲，迫使法官宣布他无罪。1934年2月经苏联政府营救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后当选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博古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6年的时间里，王明躲避了战争的血雨腥风，坐镇共产国际遥控中共临时中央，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九死一生的残酷斗争和血洗的长征磨难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延安。

这次回国，王明是乘坐苏军飞机于11月14日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孟庆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康生和一位苏联顾问(未见史料公布其姓名)。

在迪化，王明一行得到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款待，盛还给王明一万美元，支持中共抗战。就在这次会面时，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两个请求，一是希望中共中央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二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当时积极亲苏亲共的新疆军阀，此前曾诚心诚意地向延安支援过几千件皮衣及枪支等物资。不费一枪一弹，新疆就能成为中共肥沃千里的根据地，这当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好事。中共中央在自己党内干部奇缺的情况下，1938年先后抽调三批干部进疆，并得到了盛世才的重用，但在他人党的问题上却极其慎重。因为新疆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在当时国际国内微妙的形势下——盛世才是靠斯大林的军事扶持而在新疆站稳脚跟的，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也是虎视眈眈——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不得不看苏联斯大林的脸色行事，王明自然不敢轻易答应他的请求。果然，斯大林对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只字不提，却要求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党证号为1859118。显然，斯大林是想通过控制新疆，达到控制中国西北掣肘中共，进而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王明在新疆停留十天左右，驻疆八路军办事处从正在这里整训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一部中抽调了九个人，组成一个警卫班，负责王明的保卫工作。随后，王明一行在甘肃永昌因天气原因短暂停留，于27日飞抵兰州，住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还有邓发、曾山等人也同机于29日抵达延安。

截至这个时间节点，王明的人生履历和革命历程，非常非常简单，无论功劳或者苦劳，都实在难以与国内中共中央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